

私立臺灣文庫的成立與營運：

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

林慶弧

修平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講師

摘要

臺灣第1座圖書館——「私立臺灣文庫」由熱心人士經過3年的籌備，創立於1901年，該文庫座落於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官員俱樂部的所在地「淡水館」，容易被誤以為具有官方的色彩。實際上這所以公眾閱覽為主，採近代化方式經營的圖書館，以會員組織的方式經營，並以收費的方式對外開放。

出刊長達47年的《臺灣日日新報》，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真實面貌，不論法令規章、時事新聞、社會現象，以至生活型態，皆有翔實刊載。該報對於「私立臺灣文庫」從明治31年（1898）的發起人會議的披露，整個籌備的過程，包括募書與募款的進度和成果，到最後「臺灣文庫」閉館，館藏的轉移與持續追蹤，皆有詳細的報導，堪稱臺灣第1座圖書館最完整的紀錄。本文以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利用當時的新聞報導內容，分析當時的整體社會氛圍與圖書館的營運。

研究發現「私立臺灣文庫」，無法繼續經營的主、客觀因素有四：第一，缺乏雄厚的經費援助，明顯地就呈現先天的缺憾；其次，該文庫所座落的館址為清季建築「登瀛書院」，傳統中國式的書院建築與現代化的圖書館格局本就不相容，且是臺灣總督府的官員俱樂部，因此讀者人數稀少且大部份是日本人士；第三，文庫工作人員雖擁有崇高的文化理想，但都非專業人員，雖有心經營，無從有更落實的推廣之道；最後，在臺灣總督府重新擘劃臺北城的現代化市容改正的潮流中，隨著「淡水館」的拆除，「私立臺灣文庫」從此走入歷史。

關鍵字：私立臺灣文庫、日治時期圖書館、社會教育、《臺灣日日新報》

壹、前言——臺灣需要圖書館

蔣渭水¹在大正10年（1921）12月10日出版的臺灣文化協會²《會報》第1號，³以日文發表名為〈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的文章，蔣氏以醫生的身份，觀察當時的臺灣社會問題，將臺灣擬人化為病患，根據其專業醫療的知識與經驗，把臺灣被日本統治後的缺憾，以及因殖民政策而導致的教育問題，臺灣民眾文化水準的現況，進行社會病理的診斷，並以醫生診斷病症的角度細膩描寫，一一指陳臺灣的文化素養與社會風氣待改進之處，呼籲臺灣同胞正視「臺灣擁有智識營養不良的症狀」，〈臨床講義〉全篇以「譬喻」為敘述的方式，分析深入切中要害，意圖為暮氣沉沉的臺灣社

- 1 蔣渭水（1891-1931），字雪谷，宜蘭人，10歲受業於宜蘭宿儒張鏡光，17歲入宜蘭公學校，就讀三年後考入臺北醫學校，接受現代醫學教育，同時對政治產生興趣，大正4年（1915）以總平均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次年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開設「大安醫院」，時常邀集醫學專門學校及臺北師範學校等校學生到他的醫院討論有關臺灣當時的殖民地情形，以及為追求解放的進行方法。蔣氏在1920年11月成立文化公司，引進中日文的文化、思想方面圖書雜誌報刊以供研究，推廣世界潮流的新思想。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文化協會の創立〉，《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年），頁137-138；黃煌雄，〈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76年）；張炎憲，〈臺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蔣渭水〉，收錄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3冊（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年）；蔣朝根，〈蔣渭水留真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年）。
- 2 蔣渭水於1921年7月拜訪林獻堂，商討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事宜，並以自己的醫院為設立事務所，積極奔走與籌備。同年10月17日，於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創立大會，會員總數1,032名，當日出席者三百多人，共推林獻堂為總理，蔣氏為專務理事。「臺灣文化協會」所吸收的會員，網羅各種階層的臺灣人，涵蓋醫師文教賢達、醫學校學生、地主商人仕紳、農工勞動階層等。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影響臺灣社會最深遠的啟蒙運動組織，其定位為以啟發臺人之文化向上為目的，有組織規模的文化運動團體。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目的是要喚起民眾，因此舉辦的活動，都是具有宣傳與教育性質，包括1921年11月28日開始發行機關報《會報》，但因內容屢屢觸犯當局，且一再受到挑剔與行政處分，在迭經更名之後，1923年決議委託《臺灣民報》刊載。並設置讀報社、舉辦講習會、開辦夏季學校、舉辦文化演講會、表演文化演劇、放映電影、普及羅馬字等。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臺北：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頁340-362。張炎憲，〈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入氏編，〈臺灣史論文精選〉（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131-132；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年），頁65-91。
- 3 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第1號原本的發行計畫，預計在大正10年11月28日發行，印刷了1,200本。但當時出版規則，須事先申請呈報審查。然而，卻因〈臨床講義〉內文，將原籍寫為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觸犯了當時政治的禁忌，而遭受禁止處分。經過文字的修訂處理後，原籍以○○○○○○○○○○○○○○○取代，而通過審查。《會報》第1號改訂版遲至大正10年12月10日發行流通。詳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會報の發行〉，《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47。

會，注入近代性改革的新活力，深具時代意義與原創性。

其實，早在「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上，⁴蔣氏報告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說明該協會成立的目的，謂「……臺灣人現時有病了。診斷的結果，臺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智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臺灣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⁵

蔣渭水認為，臺灣文化的病因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病原」既被診斷出，蔣氏緊接著闡述協會對未來的目標，擘畫未來臺灣文化發展的抱負。「至於作為療法—知識的營養療法—的主要手段，應包括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就學校教育來說，雖然在政府已相當的努力，但是其結果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而且有前途茫茫之憾。因此，待本會日後漸漸發展至相當基礎之時，在實力許可的範圍內，才準備擴及此項正規的學校教育。目前只針對政府力量未及之處，且實行容易的社會教育方面著手。社會教育裡也有補習教育、成人教育、幼稚園、圖書館等各種項目，但目前本會想著手的只有左列數項：

- 一、本會會報之發行
- 一、各市街設立讀報社（新聞雜誌閱覽所）
- 一、設立幼稚園
- 一、創設補習教育機關

4 1921年10月17日下午19點，於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行「臺灣文化協會」創立大會，過程與內容被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派來的人員詳細記載，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文化協會の創立〉，《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37-140。

5 蔣渭水，〈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收入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頁698-699。〈臺灣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為蔣渭水於1921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致辭講稿（日文），原刊載於《臺灣臺灣文化協會會報》創刊號，目前該創刊號已散佚不可得，後來重新編輯《蔣渭水全集》時，由戴國輝遺孀林彩美捐出1932年由蔣氏遺集刊行會編纂出版的《蔣渭水遺集》，文獻出土始末詳見蔣朝根，〈文學的蔣渭水，革命的蔣渭水——《蔣渭水全集》補遺〉，收入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757-758。

- 一、設置體育訓練機關
- 一、組織文化宣傳隊
- 一、設立簡易圖書館
- 一、設立漢文研究所
- 一、電影及文化劇
- 一、各種講演會

以上即本會創設動機及目前應著手事業的概況。」⁶

經過蔣氏的歸納整理，上述的說明，在隨後出版《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第1號刊登的〈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濃縮成為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等5味藥方，如同「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的〈趣意書〉中所揭示的，臺灣文化協會不僅要「以謀提高臺灣文化」，更要「謀教育之振興，推行體育之獎勵，進而培養藝術趣味」，⁷啟蒙臺灣民眾的文化與教育，此後臺灣文化協會的工作，便大致以蔣氏開出的處方為主軸。

然而我們觀察後來臺灣文化協會的作為，可以發現該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中，以設立讀報社為用力最深的工作，全臺共設有25處讀報社，讀報社購置臺灣與日本的新聞雜誌，甚至訂購中國報紙供民眾閱覽，如該期內容有關殖民地解放運動與民族自決的文章或消息，特別會用紅筆圈點，以引起讀者注意，⁸初期由總部提供經費，後期由各支部設法維持；⁹舉辦「各種講習會」以啟迪民智，提高民眾的知識水準，單場次的內容有臺灣通史、法律、

6 蔣渭水，〈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收入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頁698-699。

7 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臺灣臺灣文化協會趣意書〉，收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38-139。

8 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統計，從大正11年至15年（1922-1926）間，全臺灣共設置了苑裡、草屯、彰化、北斗、員林、社頭、嘉義、屏東、岡山、大湖、臺北、臺南、彰化、苗栗、新竹、竹南、斗六，另高雄設有8處讀報社，但未詳細說明地點。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讀報社の設置〉，《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48。

9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41。

衛生、通俗學術、西洋歷史、經濟學等範圍，邀請當時的名人進行演講，¹⁰更從大正13年（1924）起連續3年舉辦夏季講習會。¹¹講習會無疑是臺灣人文化啟蒙、接受新知的重要窗口，講座舉辦時，雖受日人監視干擾，講者仍孜孜不倦，聽者亦風雨無阻，足見其號召力。¹²

此外，大正12年（1923）開始，臺灣文化協會以機動性、普及性的文化演講巡迴全島，是該會接觸民眾層面最廣、最重要的影響啟蒙活動。¹³根據總督府警務局的統計，文化講演聽眾每年達一萬人次以上，最盛時期的大正14年（1925），甚至超過十萬人次。¹⁴後期更將舉辦活動方式擴展至文化戲（戲劇表演）、¹⁵映畫宣傳隊（電影播放）等藝術形式，¹⁶上述活動每每舉辦時，引起當時民眾夾道歡迎，甚至鳴放炮竹有如示威，即使受到地方當局的禁止或解散，仍無視警察存在的反抗氣勢，後來成為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等先驅。¹⁷張炎憲認為，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是臺灣知識菁英接受近代思潮之後，產生的第一次自覺運動，也是臺灣人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¹⁸

10 當時講習的師資群有，連雅堂主講臺灣通史，蔡式穀主講通俗法律，蔣渭水、石煥長、林糊主講通俗衛生，林茂生主講西洋史，陳逢源主講經濟學等。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各種講習會〉，《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48-150。

11 夏季講習會上課地點在臺中州大屯郡霧峰庄林獻堂宅，大正13年（1924）學員計64名上課1週，大正14年（1925）學員計170名上課兩週，大正15年（1926）學員計79名上課10天但在臺灣總督府的嚴格取締下，無法繼續延續辦理。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夏季講習會〉，《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50-151。

12 臺灣通信，〈言論之取締〉，《臺灣民報》，第2卷第5期（1924年5月11日），版11。

13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68-370。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頁303。

1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講演會〉，《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51-152。

15 所謂「文化戲」，受到中國五四運動後勃興的話劇影響，以改良臺灣的傳統演劇，大都含有諷刺社會制度或激發民族意識的內容。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69。

1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映畫に依る宣傳〉，《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57-158。「映畫宣傳隊」的成立緣由，大正14年（1925）年秋，蔡培火之母71歲生日時，臺灣文化協會同志為祝賀蔡母之誕辰，集了1,300餘圓為賀禮，蔡培火將此經費捐給臺灣文化協會作電影隊之基金，而後更又募集三千多圓作為挹注，隔年3月蔡氏與第7次臺灣議會請願委員到東京，購買美國製放映機與宣傳影片7卷，並訓練協會青年操作使用，到臺灣各地放映，爾後蔡培火更到東京與上海蒐購影片，至於映畫宣傳隊取名為「美臺團」，其意義為美化臺灣。該團播放學術或紀錄影片同時，加之以說明者（辯士）生動活潑的夾雜諷刺的口白內容，當時頗受民眾好評，見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頁361-362。

1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講演會〉，《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51。

18 張炎憲，〈臺灣人的文化自覺運動〉，收入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序）》，頁7。

總括而言，臺灣文化協會如火如荼的進行各項活動，推廣文化的宣導、啟蒙民眾的知識，是透過會報的發行、設立讀報社、舉辦通俗講演會、開辦夏季學校，實施文化講演和文化劇活動以及美臺團電影隊，即用此宣傳和教育途徑來執行。在諸多的文化活動項目中，唯獨未見設置圖書館這項文化機構。¹⁹難道在蔣氏發表〈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之前，臺灣未曾出現過圖書館？或是尚未出現如蔣氏認為的「極量」圖書館？如果在這之前已出現圖書館，這些圖書館是由誰來設置？誰來經營？誰來利用？如何利用？

我們可以發現早在蔣氏發表〈臨床講義——臺灣と云ふ患者に就て〉的前二十年，即明治34年（1901）在臺北的「淡水館」²⁰已成立「私立臺灣文庫」（以下簡稱「臺灣文庫」），由於「臺灣文庫」是臺灣圖書館史上最早的近代化圖書館，關於該館的研究已有多篇論文，國內學者有馬少娟與莊麗蘭介紹日治時期的臺灣圖書館發展，²¹惟未深入探討「臺灣文庫」的運作情形，僅介紹創立緣起。爾後有張園東直接以「臺灣文庫」為研究對象，張園東的論文著重在探討「臺灣文庫」的創立緣由，關於該館營運情形，惜未能全面分析。²²至於學位論文則有曾堃賢，²³該論文因以日治時期為研究範圍，關於「臺灣文庫」的運作，僅就閱覽作為主軸，未能全面探討。

19 依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內容，將所有的「文化運動」逐項詳加檢視，在所有團體舉辦的各項活動，唯獨未見有設置圖書館的項目。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頁11-309。

20 「淡水館」乃是清領時期的「登瀛書院」，光緒6年（1880）由臺北知府陳星聚發起，籌募官民捐款興建，最早位於府後街的考棚內，後再遷建於西門內，該街並改稱書院街。日本統治臺灣後，接收該書院作為臺灣總督府官員社交聯誼、娛樂休憩的場所，類似臺灣總督府官員俱樂部的設施，取其「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取名為「淡水館」，黃俊銘，〈總督府物語：臺灣總督府暨官邸的故事〉（臺北：向日葵文化，2004年6月），頁26。另根據郭雙富典藏1900年出版的《臺北市街全圖》，很明顯可看出「淡水館」位於市區的重要位置，《臺北市街全圖》（臺北：臺灣總督府，1900年）。

21 馬少娟，〈臺灣區公共圖書館史略（1895-1976）〉，《教育資料科學月刊》，第11卷第3期（1977年5月），頁26-31。莊麗蘭，〈臺灣公共圖書館發展史——1901-1949年〉，《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28卷第1期（1999年9月），頁87-130。

22 張園東，〈日據時期私立臺灣文庫之研究〉，《書苑季刊》，第23期（1995年1月），頁49-56。

23 曾堃賢，〈日據時期（1895-1945）臺灣區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6月）。

後來張園東將碩士論文重新整理後，出版《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²⁴關於「臺灣文庫」的內容與原刊登〈日據時期私立臺灣文庫之研究〉1文無大差異。林景淵《日據時期的臺灣圖書館事業》1書，²⁵關於「臺灣文庫」僅介紹成立緣起，關於營運較少著墨。



圖1 淡水館的座落位置，很明顯可看出「淡水館」位於市區的重要區段。

資料來源：《臺北市街全圖》（臺北：臺灣總督府，1900年）。（郭雙富藏）

至於日本學者宇治鄉毅的研究，在〈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

24 張園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4-21。

25 林景淵，《日據時期的臺灣圖書館事業》（臺北：南天書局，2008年），頁13-19。

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図書館の軌跡を中心に-」文中，²⁶則簡略介紹該文庫在「石坂文庫」設置前的情形，與在臺灣圖書館發展史上的定位。加藤一夫等日本學者合著《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²⁷重點在於分析其成立的動機，與歷史上的意義。

本文擬另闢研究的範疇，利用當時編印的《臺灣日日新報》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出刊長達47年的《臺灣日日新報》，²⁸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真實面貌，不論法令規章、時事新聞、社會現象，以至生活型態，皆有翔實刊載，利用當時的新聞報導分析當時的整體社會氛圍。但為求敘述之完整，將以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引進西方現代化圖書館為背景，說明日本的圖書館事業規模。此外，本文也運用日治時期刊登在期刊雜誌上關於「臺灣文庫」的文章，還原「臺灣文庫」的運作情形，與其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貳、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制度

19世紀末的日本是個激烈變遷的時代，新思潮傳播、新法律公布、新制

26 宇治鄉毅，〈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図書館の軌跡を中心に—〉，《同志社大學圖書館學年報・別冊》，30期（2004年6月），頁16-40。該文有中譯，詳見宇治鄉毅著、何輝國譯，〈石坂莊作與石坂文庫——以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先驅圖書館之軌跡為中心〉，《臺灣學研究通訊》，第2期（2006年12月），頁82-101。

27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東京：社會評論社，2005年），頁78-80。

28 《臺灣日日新報》是由《臺灣新報》和《臺灣日報》兩家日系報紙合併而來，在第4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面調停，命守屋善兵衛將兩報買下，合併為《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1年（1898）5月6日正式發行，因為有臺灣總督府做後臺，並補助辦報經費，《臺灣日日新報》也成為日治時期臺灣發行量最大的第一大報。最高發行量還曾達五萬份之多，而在臺工作的日本人、駐在山區的警官都要訂閱。報方還延攬多位著名日籍文人學者擔任編輯，由是出版品質因而冠凌一時。其間尚有國學大師章炳麟（太炎），舉人羅秀惠，漢學家連橫、李逸濤等任職該報，為《臺灣日日新報》良好發展奠下基礎。出刊長達47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有其輝煌歲月，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真實面貌，皆有翔實刊載。因此，已成為今日研究臺灣歷史最具價值的史料之一。目前最完整的《臺灣日日新報》，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完整珍藏，拜數位化的便利，現在已能利用《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查詢所有原檔，對本文的幫助甚為重要。

度出現，國家領導者競相為創造1個現代國家而努力。²⁹明治元年（1868）明治維新是日本邁向近代化的重要歷程，³⁰也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變革、重要的轉折點，從政治體制的改革開始，涵括軍事、經濟、工業、金融與教育制度等，皆學習當時的歐洲各國與美國的成功經驗，³¹在短短不到26年的勵精圖治，於明治27年（光緒20年、1894）打敗當時亞洲的最大國——清國，並簽訂「馬關條約」，清國割讓臺灣給日本。³²

從殖民政策的角度審視，作為日本的第1個殖民地，觀察日本統治臺灣50年，教育是確保民政統治的基礎，臺灣總督府大量依賴明治時期本國的教育制度的理念和經驗，來制定臺灣的教育計劃，³³所推動的教育形制，可謂是臺灣近代西式教育之發軔。³⁴日治時期由殖民政府倡導的初期教育，其實只是滿足政權開展統治需要，因此著重在語言教育，以作為開化臺人認日本為宗主國之教育意識。臺灣的教育因而以基礎教育為主，以訓練臺灣人在新世界生活和工作，更重要的是使臺灣百姓無條件效忠於日本，將原本清國的一隅改造成現代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³⁵因此明顯地，基層孩童教育是臺灣總督府的當務之急，學校教育必須配合政府的需要。對於圖書館事業的建設作為，相較於其他事業的開展，如教育、公共衛生、交通建設、實業發展等，不但起步較晚，且統治初期未見臺灣總督府或其他層級的政府單位推動。

29 E.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年6月），頁1。

30 呂理州，《明治維新》（臺北：遠流出版社，1994年），頁221-269。

31 田中彰著、何源湖譯，《明治維新》（臺北：玉山社，2012年），頁227-276。

32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53。

33 E.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8。日本取得第1個殖民地臺灣，躋身殖民帝國之林，很自然引起世界各國的注視，日本統治初期目標是把臺灣治理成殖民地的模範——一個有秩序、經濟的生產區，一個和平的、工業人口眾多的地區。但經過數年臺灣人民的抵抗後，日本當局意識到軍事鎮壓不是統治的最佳辦法，欲有效治理臺灣，開發臺灣資源，並爭取臺灣人民合作，唯有從內政著手，而教育即為內政措施的重要功能，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根本改變的工具，這是當時日本的野心和計畫。另見黃秀政，〈評介鶴見著《日據下的臺灣殖民教育》〉，收入氏著，《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264-265。

34 張勝彥等編著，《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頁249。

35 E.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9。

明治31年（1898）3月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派任抵臺，其在任的8年內，對教育的總指導策略為，發展完整且良好教育的臺灣人階層，以供職於殖民政府與庶務機構、教育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普及女子學校教育、產生臺籍教師和醫護專業人員、和使本島的學校制度盡可能地自給自足。³⁶為達上述目的，此一階段以建置公學校、小學校、師範學校和醫學校為主。

但初期的臺灣新式教育推展並不順利，明治33年（1900）3月兒玉源太郎總督透過在「淡水館」舉辦「揚文會」，³⁷對具有影響力的仕紳階層宣達日本現代教育的優越，並鼓勵臺灣子弟進入臺灣總督府所設立的學校就讀。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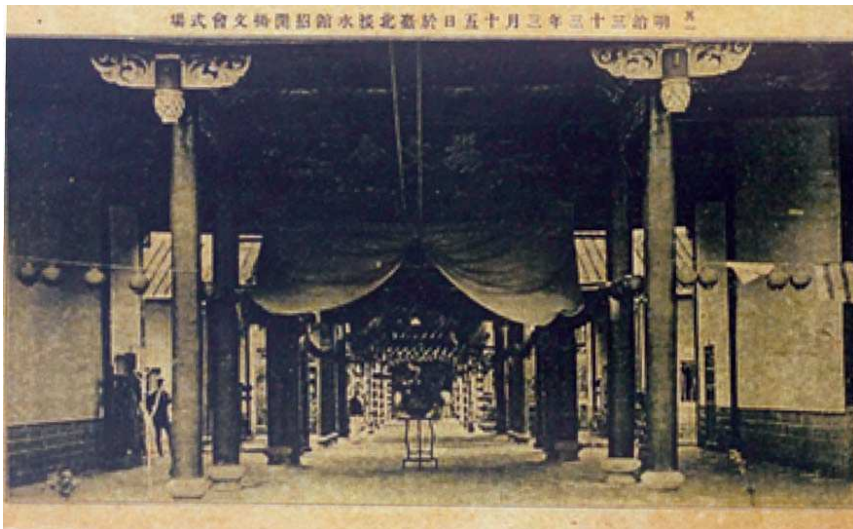


圖2 明治33年（1900）3月15日在臺北淡水館舉行「揚文會」，在傳統的原「登瀛書院」特別佈置裝飾。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揚文會》（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1年）。（郭雙富藏）

36 E.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15。

37 臺灣總督府，《揚文會》（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1年）。該書由郭雙富典藏，內容為兒玉源太郎總督（1852-1906）邀請全臺具有廩生以上的仕紳，作為該會的貴賓，請這群全臺半數上層的仕紳階級，針對提升臺灣教育與文化提供策議，彙訂成冊以資便覽，並與全體與會者攝影留念。

38 該次「揚文會」的舉辦目的，表面上是請仕紳提供臺灣總督府教育文化的建議，實際上卻是爭取臺灣仕紳對新政權改革計畫的了解與支持，並宣揚新式教育的優點，這群仕紳階級全程受到細心的安排與宴飲款待。見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頁351。



圖3 明治33年（1900）3月15日在臺北淡水館舉行「揚文會」，與會仕紳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揚文會》（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1年）。（郭雙富藏）

明石元二郎總督認為臺灣人必須被教育成日本人，以強化日本擁有臺灣，打破語言、風俗、習慣的藩籬並非易事，即使官僚們認為這是件不可能的任務，明石總督仍要求屬下認真執行。³⁹該計畫後來成為大正8年（1919）頒布教育令的基本架構，該年元月4日敕令制定的第一號「臺灣教育令」，首次將殖民地所有臺灣人的公立學校整合成為單一系統，且相互配合的體系。⁴⁰1919年總督府所揭示同化主義方針，雖然由此確立臺灣人的教育制度，但就實施教育內涵分析，不管修業年限或教育程度品質皆遜於日本本土教育，矢內原忠雄當時就批評，大正11年（1922）以前之臺灣教育，「係藉降低臺灣人之教育程度，使日本人取得領導者與支配地位」。⁴¹這次的教育改革，改進且增加臺灣人的職業教育機會，讓更多受過現代化的專業教育的臺灣人，能夠進入正在快速起飛的工業和商業部門工作，使臺灣人的

39 又吉盛清，〈沖繩教育と臺灣教育〉，《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1999年第2期（1999年11月12日），頁55。明石元二郎（1864-1919）視為臺灣第7任總督。

40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2000年），頁156-161。

41 矢內原忠雄（1893-1961），《矢內原忠雄全集》，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年），頁347。

利益與統治者的利益更緊密的結合。⁴²

大正8年（1919）文人首次取代武官擔任臺灣總督，接任的是田健治郎，這位第1任的文人最高行政首長，田健氏更是要將臺灣徹底日本化，及讓臺灣人同化的總督，他希望教育臺灣人成為道地的日本人，於是3年後，大正11年（1922）頒布「改正臺灣教育令」，將中學改成為日臺共學制，⁴³龐大的日本化運動也在學校外進行。⁴⁴昭和11年（1936）開始實施的「皇民化」運動，除了在公學校徹底地進行教化，時數增加很多的日語課和修身課，對每一位臺灣學童徹底的改造，更將焦點集中在成人和未入學的兒童。⁴⁵

日本教育給臺灣人帶來決定性的轉變，學校是有效的改革工具，同化教育實行的結果，在殖民時期結束時，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中上階層，已經完全吸收了日本的品味和心態，在生活上和態度上，更加親近日本統治者。⁴⁶綜而言之，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基礎教育的目的就是為母國服務，普及基礎教育有兩大任務，第一是凝聚國民意識、灌輸效忠國家的觀念；第二是給於現代化的過程中，教導日本模式的修養、技能和態度。給於適度的社會化和職業技能，成為一股穩定的力量，讓臺灣人民成為日本實踐國家目標的有用工具。⁴⁷

而圖書館屬於社會教育的重要一環，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民間學者與官員皆大聲疾呼設置圖書館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大量設置且遍佈各地的公共圖書館，是19世紀日本推動現代化智識啟蒙的重要憑藉。臺灣總督府領臺初期將注意力運用在軍事的行動上，臺灣的社會教育機構設施，隨著社會治安

42 E.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71-72。

43 黑田甲子郎，《田健治郎傳》（東京：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1932年），頁383。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年），頁124-125。田健治郎（1855-1930）是為台灣第8任總督。

44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頁218-220。

45 弘谷多喜夫，〈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國民」形成と教育〉，收入阿部洋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第3部臺灣の部（東京：龍溪書舍，2004年），頁285。

46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2013年），頁201。

47 E.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頁184。

與地方秩序的底定、地方制度的確立與實行、教育的普及與產業的振興，而漸次發展。

臺灣教育統制機系統，也確立了社會教育的重要性。社會教育最初的統制機關為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大正15年（1926）臺灣總督府文教局成立，共分學務課、庶務課、督學室及社會課，後期的社會教育以同化為宗旨，社會教育的範圍包含廣泛，從國語講習所（含一般講習所、簡易講習所與幼兒國語講習所），部落教化團體、青少年男女青年團、青年訓練所，到圖書館、博物館、各種展覽會、映畫隊等，都是日治時期的社會教育。其行政業務則劃歸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下的社會教育股社會教育係掌管，地方則屬各州內務部的教育課社會教育係負責的業務範圍，至於廳與郡則是庶務課掌理，市則由教育課社會教育係統籌、街庄則由庶務係負責社會教育的業務。⁴⁸

從明治28年到昭和20年（1895-1945），有學者將日治時期的臺灣圖書館事業分為5期，⁴⁹1.私立圖書館時期，明治34年（1901）1月民間有志者設立「臺灣文庫」，不僅是臺灣近代圖書館的發端，也是日本人在臺灣殖民地最早設立的圖書館；明治42年（1909）10月實業家石坂莊作在基隆創立「石坂文庫」，更是開啟私人設立免費公共圖書館的先河。2.官立圖書館時期，大正3年（1914）4月，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隔年「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正式開館，是日治時期唯一官方設立的圖書館，對領導臺灣圖書館的整體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力。3.地方圖書館時期，大正12年（1923）4月臺灣總督府頒布《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在其後兩年間，呈現地方設立圖書館的興盛現象；此外，昭和2年（1927）「臺灣圖書館協會」成立，更帶動地方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置。4.學校圖書館時期，昭

48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統制機關〉，收入《臺灣社會教育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1933年4月），頁1-2。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年），頁139-140。

49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東京：社會評論社，2005年5月），頁75-104。

和3年（1928）年4月「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成立，該館是日治時期唯一大學圖書館，不但組織健全、預算充裕、設備齊全，經營制度先進，館藏更是豐富、具有特色，比起日本本土的其他帝國大學圖書館毫無遜色。再者，臺北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中高等農業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和各地師範學校，也都設置附屬學校的獨立圖書館，這些學校圖書館也都具有一定的規模。⁵⁰5.專門圖書館時期，昭和6年（1931），臺灣成為日本南進政策的前進基地，昭和16年（1941）9月實業家後宮信太郎捐款成立「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專門蒐集南洋的相關資料，可視為臺灣專門圖書館的起源。⁵¹上述的分期依據圖書館的組織類型為主，強調因服務對象的不同，而區分不同時期的發展。

亦有學者認為日治時期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應與臺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同步，將之簡化為3期，第1時期自明治28年（1895）至大正8年（1919）年3月《臺灣教育令》公布，可稱為「同化時期」，彼時的圖書館屬於萌芽時期；第2時期從大正8年到昭和6年（1931）9月的「918事變」止，是為「過渡期」，該時期的圖書館建設由上而下推動，圖書館事業非常興盛；第3期由昭和6年（1931）到日本戰敗，此一時期乃「皇民化時期」，所有施政作為，完全根據「南進政策」和「皇民化運動」實施，圖書館在此時期亦扮演非常重要的工具角色。⁵²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本文較為贊同後者的觀點。

50 王麗蕉、黃燕秋、李依陵，〈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概況及其數位典藏發展〉，《國家圖書館館刊》，101年第1期（2012年6月），頁4-6。

51 不著撰人，〈南方資料館後宮氏寄附の百萬圓で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9月16日，版3。

52 宇治鄉毅，〈近代日本図書館の歩み——臺灣の図書館〉，收入日本図書館協會編《日本図書館協會創立百年記念》（東京：日本図書館協會，1992年3月），頁855。

參、日本圖書館的起源與發展

欲瞭解日治初期「臺灣文庫」成立的動機，以及為何是由一群熱心的知識分子出資經營，有其時代背景的特殊性，需先探討日本國內圖書館的起源，瞭解其發展的型態與過程，作為近代臺灣圖書館史的考據源流。

關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決心和政策外，知識份子所扮演的啟蒙角色亦不容忽視，⁵³其中又以「明六社」的影響最為顯著，⁵⁴在「文明開化」的旋風中，引領日本社會朝向全盤西化，引進西洋文明的近代化思想與潮流。⁵⁵當時對啟蒙運動貢獻最大，影響也最深遠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⁵⁶將其在海外的見聞，出版第一部介紹西洋文明的《西洋事情》著作，最早以「文庫」一詞翻譯介紹西方的公共圖書館，尤其對大英博物館內的圖書館介紹更為詳盡。⁵⁷西方的圖書館觀念就是在這個時期傳入日本；⁵⁸此外，福澤氏更鳩合同志共創「京都集書院」，是日本近代第1所公共圖書館，亦為日本圖書館史上的濫觴。⁵⁹

53 鈴木博雄，《原典・解說日本教育史》（東京：日本図書文化協會，1985年），頁196-199。

54 「明六社」是森有禮於1873年發起成立，該年為明治6年，便取為「明六社」，成員有福澤諭吉（1834-1901）、西周、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等10人，該社透過發行《明六雜誌》與翻譯或著作，將西洋文化與思想啟蒙日本民眾，其中為了傳播西洋文明的學術重要概念，創造出新的翻譯漢字語彙，是為新漢語，例如「哲學」、「主觀」、「客觀」、「理性」、「歸納」、「演繹」、「權利」、「義務」、「社會」、「具體」、「抽象」、「觀念」、「教育」、「印象」、「心理」、「社會教育」等，李永熾，《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臺北：水牛出版社，1991年），頁18-29。

55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頁249。

56 福澤諭吉，一生始終以在野之身，致力鼓吹自由民權思想，並創辦慶應義塾，教育學子；著作等身，出版《西洋事情》、《勸學》、《文明論之概略》、《福翁百話》等，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傳播西洋文明，對日本人民的思想啟蒙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福澤諭吉著、楊永良譯，《福澤諭吉自傳》（臺北：麥田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另見呂理州，《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臺北：遠流，1993年），頁15。

57 福澤諭吉最早以「文庫」一詞翻譯介紹西方的公共圖書館。福澤諭吉，《西洋事情・初編》，收入《福澤諭吉全集》，卷1（東京：時事新報社，1898年），頁34-35。

58 鈴木博雄，〈圖書館の創設〉，收入氏編《原典・解說日本教育史》（1985年5月），頁266。

59 日本的傳統藏書機構稱為「書庫」、「書府」、「書籍館」或「集書館」，京都集書院成立於1872年，為日本近代最早的公共圖書館，係由福澤諭吉、榎村正直、大黑屋太郎右衛門3人所創立，是京都府立圖書館的前身。椎名六郎，《新図書館学概論》（東京：學藝社，1986年），頁50。

福澤氏對於西方文明的推崇與欣羨，從其著作中可以得知，他認為日本應於全國都、府、縣各地普及設置圖書館，不但要各種藏書豐富，且要開放讓人民自由借閱，⁶⁰完全具備現代化圖書館機能的經營理念。此後，歷經久米邦武、田中不二麻呂、和目賀田種太郎的海外考察，回國後大聲疾呼圖書館的重要性，並建議政府積極推動建設，⁶¹對日本圖書館事業的理念推廣，產生推波助瀾的功效。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民間學者，與後來的派出的考察官員或留學生，回日本後對於歐美各國的圖書館制度大力推崇，更在握有實際行政資源後，努力加以實踐建設圖書館的初衷理想。

明治5年（1872），文部省出仕市川清流對當時的大輔提出《建設書籍院建議白皮書》，隨後公立湯島書籍館設立，是第一所官方設立的現代公共圖書館。⁶²明治7年（1874）田中不二麻呂擔任文部省大輔，田中氏原本對於公共圖書館已有相當程度的認知，在其任內公布《公立書籍館設置要點》，爾後亦積極圖書館事業，對於日本地方圖書館的普及居功厥偉。⁶³明治8年（1875）文部省成立東京書籍館，⁶⁴兩年後因西南戰役導致國家財政困難，該館移交給東京府管理，明治13年（1880）又改隸於文部省，名稱改為「國立東京圖書館」。⁶⁵

明治22年（1889）用敕令規定東京圖書館制，明顯地日本教育行政者已

60 田中王堂，《福澤諭吉》（東京：みすず書房，1987年），頁141-145。

61 久米邦武（1839-1931），1871年跟隨岩倉使節團出訪，回國後出版《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對於美國開國元勳福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於1731年倡議成立「費城圖書館俱樂部」（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有專章詳細介紹其創立與運作模式；對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制度亦有詳盡的考察紀錄。田中不二麻呂（1845-1909），1871年岩倉使節團成員之一，負責考察歐美各國教育制度，1874年擔任文部大輔，將成立公共圖書館的必要，並撰寫多篇論文提出理念說明，1877年在《文部省第四年報》正式掲載〈公立書籍館設置要點〉，對於日本公共圖書館的普及化為實際政策。目賀田種太郎（1853-1926），日本第1屆公費留美學生，研習法律，回國後大力讚揚美國公共圖書館制度，建議明治政府應聘用外國專業館員來經營日本的圖書館。佐藤忠恕，《圖書館の文化史的研究——明治末期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77年），頁30-36。

62 綿拔豊昭，《図書館文化史》（東京：學文社，2006年），頁81。

63 寺田光孝、加藤三郎等，《圖書及び図書館史》（東京：樹村房，1999年），頁158。

64 潘淑慧，《日本公共圖書館的經營與管理》（臺北：望春風出版社，2008年），頁2-3。

65 水谷長治，《図書館文化史》（東京：勉誠出版社，2003年），頁94-96。

著力於圖書館的教育行政領域，⁶⁶可以窺見國家圖書館的雛形架構。明治25年（1892）東京圖書館第1任館長田中稻城完成歐美圖書館學習考察返國，而東京公立圖書館館員藉由田中館長回國的契機，決議成立永久性的圖書館員專業組織，於是創立「日本文庫協會」，其宗旨為：「提升本國圖書館事業的發達與進步，針對圖書館與圖書進行相關事項的研究。」⁶⁷「日本文庫協會」成立之初，主要目的在提升日本國內對圖書館的研究，增加館員間專業知識的互惠，並加強其對於圖書館經營與書目研究之興趣，謀圖書館事業的進步發展，象徵圖書館事業邁向專業化經營，該協會對日本圖書館事業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於明治36年（1903）在東京大橋圖書館舉辦「第一回圖書館事項講習會」，⁶⁸此為日本圖書館學教育之起源，此後十餘年間，日本各地都陸續開設類似的教習所、講習所，推動日本圖書館學的發展。⁶⁹該會於明治41年（1908）更名改稱「日本圖書館協會」（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JAL）。⁷⁰

明治28年（1895）民間爭取成立國家圖書館的輿論高漲，2年後公布《帝國圖書館官制》，第1所國家圖書館正式成立；明治32年（1899）公布《圖書館令》，⁷¹各地公共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建設，開啟公共圖書館的新紀元；⁷²明治39年（1906）帝國圖書館新館落成，日本圖書館的建設進入新

66 馬宗榮，〈日本圖書館事業的史的研究〉，《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季刊》，第4卷第2期（1932年6月），頁184。

67 竹內愼，〈わが国の図書館教育1892-1955〉，收入日本図書館学会研究委員会編，《図書館学の教育（論集・図書館学研究の歩み、第3集）》，上（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83年），頁5。

68 寺田光孝、加藤三郎等，《圖書及び図書館史》，頁162。

69 陳光華、林欣怡，〈日本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與現況〉，《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刊》，第16期（2001年11月），頁119。

70 參見〈日本図書館協会の歴史〉，收入「日本図書館協会」網站：www.jla.or.jp/jla/tabid/226/Default.aspx（2014年2月11日點閱）。

71 「圖書館令」（敕令第429號，明治32年11月11日）。詳參簡耀東編，《中日韓三國圖書館法規選編》（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公司，1994年），頁26-27。

72 馬宗榮，〈日本圖書館事業的史的研究〉，頁185。

契機，隔年（1907）《圖書館雜誌》創刊發行，⁷³代表進入現代圖書館的專業學術領域。⁷⁴

截至明治41年（1906）的統計，日本國內的圖書館總計86所，⁷⁵該年日本圖書館協會成立「圖書館員養成所設置委員會」，建議文部省設置培育圖書館員的專職機構，並為之積極奔走。⁷⁶經過數年的努力，大正9年（1920）文部省終於決定成立「圖書館員教習所」，為日本圖書館學教育開啟新局面，奠定良好的紮根基礎。⁷⁷

綜括而言，日本的公共圖書館，隨著國運的進展，社會的進步，在數量上有明顯的增加，服務的項目亦隨擴展，圖書館專業組織帶領的學術研究，也有明顯提升。明治末期的日本，除成立國家級的「帝國圖書館」外，最重要的是《圖書館令》的公布，且政府大量投入建設地方圖書館；圖書館員基於對圖書館事業的使命感，也成立日本第1個圖書館員專業組織「日本文庫協會」，並發行《圖書館雜誌》，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或贊助成立新興圖書館事業，是日本圖書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專業服務的質與量均向上提升。

肆、臺灣文庫設立緣起與經過

明治31年（1898）臺灣社會治安局面稍加平靜，各項施政也漸上軌道，受到明治維新的影響，在臺的日籍知識分子倡議引進近代圖書館經營模

73 《図書館雑誌》自明治40年（1907）10月17日創刊第壹號以來，迄今已發行107年，1964年適逢日本圖書館協會創立70周年，編印《図書館雑誌総索引》，提供發刊以來的論文檢索，詳見日本図書館協会編，《図書館雑誌総索引》（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64年）。

74 佐藤忠恕，《図書館の文化史的研究-明治末期を中心として》，頁7。

75 松本，〈トショカン〉，《大百科事典》，第19冊（東京：平凡社，1933年），頁166。

76 長澤雅男、戸田慎一編，〈図書館学教育〉，《図書館学研究入門：領域と展開》（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93年），頁14。

77 嶋田晋，〈カリキュラムに見る日本の戦前と戦後の図書館学教育の連続性〉（東京：慶応義塾大学文学部図書館・情報学科卒業論文，2000年），頁2。

式，⁷⁸有必要建立公開的文庫，⁷⁹以獎勵人文的發達，認為臺灣設立圖書館的時機已然成熟。⁸⁰

「臺灣文庫」的設置，主要是來自於駐在臺北的各界有心人士倡議，從發起、集資、籌備到開館耗時3年餘，首倡者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總編輯的枋內正六，⁸¹於明治31年（1898）5月在報社內提出構想，經數人附議，並得到社長守屋善兵衛的贊同，⁸²聲明願提供個人所藏之書以為響應。⁸³同年10月下旬多位在臺的知識份子在新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⁸⁴的官邸聚會，這次文化界的聚會，後來成為「臺北圖書館發起會」，⁸⁵公推石塚英藏為主席，⁸⁶針對設立臺北圖書館的議案進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與會者中

78 木母浮浪，〈臺灣圖書の蒐集〉，《臺灣時報》，第64期（1915年1月20日），頁34。內文詳細記載當時在臺日人的文化聚會，咸嘆臺灣的文化事業不興盛、圖書報章的缺乏，並提出對設立圖書館的殷切期盼。

79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發起人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7月7日，版2。

80 伊能嘉矩，〈臺灣圖書館小史〉，收入於石坂文庫編，《私立石坂文庫第5年報》（臺北：石坂文庫，1914年12月），頁24。

81 枋內正六（1863—？）時任《臺灣日日新報》編輯長，被稱為當世的奇才，在新聞界堪稱交際高手，穿著時髦，工作勤奮。はまのや，〈枋內正六君〉，《臺灣商報》，第36期（1899年12月23日），頁3。

82 守屋善兵衛（1866-1930），東京都目黒區人，歷任《臺灣日日新報》社與滿州日日新聞社社長，逝世後，其家人捐出住宅成立紀念圖書館。詳見〈目黒区立守屋図書館訪問記〉（2013年4月28日），收入「東京図書館制覇」網站：tokyo-toshokan.net/00000472.htm（2014年3月25日點閱）。

83 山中樵，〈臺灣から（一）臺灣文庫と石坂文庫〉，《圖書館雜誌》，第22卷第10期（1928年10月），頁242。

84 後藤新平（1857—1929）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期間（1898年3月1906年11月），初期的施政主軸有3，進行臺灣舊慣的調查、確保臺灣治安、土地大調查；後期則注重建設交通網、充實公共衛生、扶植產業發展與文明開化的事業。雖然在其任內並未興建圖書館，但是對於「臺灣文庫」的創立，採取支持鼓勵的態度。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後藤新平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4月），頁34-53。

85 不著撰人，〈臺北圖書館發起會〉，《臺灣協會會報》，第2期（1898年11月20日），頁85。是日聚會的人士計有後藤新平、石塚英藏、藤田嗣章（1854—1941；時任臺灣守備軍醫部長）、堀內文次郎（1863—1942；時任臺灣總督府副官）、松岡辨（？—？）、木村匡（1860—1940；時任臺灣總督府學務課長）、高橋昌（？—？；時任民政局殖產課技師）、兒玉喜八（？—？；時任民政局學務課事務官）、町田則文（1856—1929；時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盲人教育家）、志村鑑太郎（？—？；時任臺北郵便電信局長）、草場謹三郎（1858—1933；時任臺灣總督府通譯官）、木下新三郎（？—？；時任臺灣日報主編）、大島邦太郎（？—？）、守屋善兵衛、枋內正六等人。當時尚未統一「臺灣文庫」的名稱，因此《臺灣協會會報》稱「臺北圖書館」。

86 石塚英藏（1866—1942）日本福島縣人，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初任法制局參事官兼書記官，1898年3月，以總督府參事官身份隨總督兒玉源太郎抵臺，後擔任第13任臺灣總督。

不乏教育界的官僚與校長，但其結論卻是認為新設立的圖書館規模大小非當務之急，但必須脫離教育體系，獨立設置比較適合，會中並選出5人為「調查委員」深入調查、研究後提出報告，5位調查委員中有4位是當時臺灣總督府的技術官僚，能掌握當時的行政資源，另1位就是倡議者枋內正六，開始進入籌備具體化的階段。⁸⁷而這些在臺的日本人也都是「臺灣協會」⁸⁸臺灣支會的會員，對於設立新式的圖書館不遺餘力。

配合「臺北圖書館」的籌備計畫，《臺灣協會會報》⁸⁹自第2期開始，⁹⁰便按月刊登〈寄贈書目〉專欄，公布各方捐贈的圖書與期刊的目錄，包含個人捐書外，政府機關與出版社皆有捐贈圖書或期刊，以臺灣文庫籌備期的明治33年（1900）為例，每月公布的贈書目錄，期刊平均約有60種、圖書約

87 「調查委員」五人為堀內文次郎、木村匡、高橋昌、兒玉喜八、枋內正六。詳見不著撰人，〈臺北圖書館發起會〉，頁85。

88 「臺灣協會」於明治31年（1898）4月在東京創立，日本政界與財界人士為配合官方殖民政策而組成的團體。「臺灣協會」的創會會頭（會長），曾任第2任臺灣總督的桂太郎，評議會總幹事由水野遵出任，在日本各地與臺灣設有支部，同年10月發行機關誌《臺灣協會會報》，進行宣傳與募款活動。協會主體成員為臺灣總督府的官僚，與在日本統治臺灣有關的政、商人士，以支援統治臺灣及培養經營殖民地人才為目的。「臺灣協會」綜理的會務主要有：1.派遣視察員，了解臺灣當地的實情；2.收集臺灣的產品暨臺灣人民最喜愛之日本產品；3.協助到臺灣發展的日本人，以及到日本做各項交流的臺灣人；4.應日本社會之需要，做有關臺灣實業上之調查暨介紹等；5.訓練兩方互相學習彼此的語言；6.在臺灣設立本會會館，推行相關業務；7.舉辦演講會；8.監督補助臺灣留日學生；9.收集有關臺灣之書籍。詳見桂太郎，〈臺灣協會の設定に就て〉，《臺灣協會會報》，第1期（1898年10月），頁1。因當時臺灣是日本唯一的殖民地，因此「臺灣協會」可以說就是「殖民協會」或「殖民研究」團體，成立的目的在結合日本官方、民間、跨行政部門、跨行業，支持臺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龐大組織。「臺灣協會」不僅發動各地日本人出錢出力支持臺灣的各項活動，甚至還設置學校，招收學生，日本各地也成立分會，臺北是為「臺灣協會」的臺灣支會所在地。當日本向亞洲進攻的政策日益明確，臺灣之外的朝鮮、滿州也都是他們全力拓殖的區域，於是「臺灣協會」這個半官民組織，基於實際需要，明治40年（1907）2月「臺灣協會」改組為「東洋協會」，位於臺北的「臺灣協會臺灣支部」改為「東洋協會臺灣支部」。詳見林呈蓉，〈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擘畫者〉（臺北：臺灣書房，2011年12月），頁128-131。

89 臺灣協會編印機關報《臺灣協會會報》，內容刊登協會動態，也是臺灣總督府的傳聲筒。當《臺灣協會會報》出版到第100期，改組為《東洋時報》。詳見林呈蓉，〈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擘畫者〉，頁112-122。

90 第2期的《臺灣協會會報》增闢〈寄贈書目〉欄，為「臺灣文庫」的設立公開募書，各界的捐書或贈閱期刊都刊載以昭公信，該期登錄的圖書有17冊、期刊17種，捐贈來源有臺灣與日本國內。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期（1898年11月），頁101-102。

有15種。⁹¹隨後在《臺灣協會會報》刊登〈臺灣文庫設立趣意書〉，全文如下：

臺灣是南海一孤島，地處偏僻遙遠，人文未開；人處斯地，多少較中央氣勢落後亦理所當然。況且社會組織稚弱，人易陷入不守規律之嫌。欲矯正此弊病，須講求研學自修之途徑。所謂研學自修之途徑，惟設立公共圖書館之外，無他途。且臺灣位置重要，是東西洋文化交流之所在。故綜合此兩洋文化予以調和，自當是在臺各個人之任務。為此，廣泛蒐集和・漢・洋圖書，其實應是在臺各個人之義務，與眼下焦眉之急務。我等同志思索及此，亟欲創設「臺灣文庫」，以資作為扶植文運之開端。至盼社會有志諸賢為此公共事業，不吝贊助。⁹²

從〈臺灣文庫設立趣意書〉這段文字分析，這群文化界的人士認為圖書館是矯正當時臺灣社會公共道德落後、組織不健全，不守社會秩序弊病的解決方案，要矯正弊端，必須由研究自修開始，透過到圖書館自修的方式來開化文明，且強調臺灣的地理環境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會處，應廣泛蒐集外文、日文與中文圖書，並呼籲所有在臺日人對於這個文化使命，要踴躍支持與贊助。

91 翻閱《臺灣協會會報》第16到27期，出版日期為明治33年（1929）1月至12月，捐贈的種類有圖書、期刊和報紙3種，捐贈的來源從日本國內各地的期刊與臺灣的地方報紙皆有，統計後每月平均會收到圖書2-48部，期刊40-78種，報紙12-27種不等。詳見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6期（1900年1月），頁78-81；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7期（1900年2月），頁80-81；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年3月），頁78-80；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9期（1900年4月），頁70-72；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0期（1900年5月），頁62-64；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2期（1900年7月），頁51-53；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3期（1900年8月），頁60-63；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5期（1900年10月），頁60-62；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6期（1900年11月），頁65-67；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7期（1900年12月），頁41-43。

92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年3月20日），頁67。

當時臺灣的書籍來源極為貧乏，⁹³大部分圖書皆須由日本進口，臺灣本地的印刷尚未發達，⁹⁴為了充實臺灣文庫的館藏，並能夠早日開放，當時的主事者，除在各種場合公開呼籲外，更積極主動地以各種方式來蒐募圖書，「文庫發起人四處奔波，聽到哪位官員或實業家的家裡有藏書，就會登門拜訪，1本兩本的蒐集；若有官員要轉任回日本，更是把握機會拜託將藏書割愛，懇求捐贈2本或3本書籍給文庫，當作紀念性的藏書。」⁹⁵

除募書的途徑外，籌備的發起人更以慶祝日本皇太子婚禮為名義，進行圖書館樂捐事宜，⁹⁶直接向臺灣各界籌募經費，進行開館的準備工作。臺灣第1座圖書館「臺灣文庫」的籌備成立可說是筆路藍縷，備極艱辛。《臺灣日日新報》也經常性刊登「臺灣文庫」的相關活動新聞，從發起人會議起，就不斷給予關心與宣傳。⁹⁷

最後擇定在當時臺灣總督府官員俱樂部的所在地「淡水館」⁹⁸舉行「臺灣文庫」開庫典禮，⁹⁹明治34年（1901）1月27日下午1時正式開館，開幕當天參加者有3餘人，由藤田嗣章報告籌備經過，並指定枋內正六、岡田、加藤等3人為「幹事」，¹⁰⁰正式對外開放，是為臺灣圖書館之濫觴。

93 山中樵，〈臺灣から（一）臺灣文庫と石坂文庫〉，頁242。

94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2005年3月），頁213-217。

95 山中樵，〈臺灣から（一）臺灣文庫と石坂文庫〉，頁242。

96 不著撰人，〈御慶事彙報其一紀念圖書館設置〉，《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21日，版1。

97 檢索《臺灣日日新報》電子全文資料庫，輸入「臺灣文庫」關鍵字，搜尋到169條相關的新聞報導，從明治31年（1898）的發起人會議的披露，整個籌備的過程，包括募書與募款的進度和成果，到最後「臺灣文庫」閉館，館藏的轉移與持續追蹤，皆有詳細的報導，堪稱臺灣第一座圖書館最完整的紀錄。參見〈《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簡介〉，收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指南網站」：tbmc-2.nlpi.edu.tw.eproxy.nlpi.edu.tw:2048/about.html（2014年2月20日點閱），該文亦可見於其他典藏有漢珍版《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之圖書館網站。

98 此處在日治初期是一個多功能的場所，由於新的官方廳舍尚未建築，又遍尋不著合適的大空間，因此只能利用該建築物，然而該館原為清季的登瀛書院，因此在格局上與圖書館的需求應不相容。早年，1900年3月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曾在該館舉辦「揚文會」。不著撰人，〈臺北の揚會〉，《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年3月），頁67-68。

99 〈臺灣文庫開庫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5日，版2。

100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庫式〉，《臺灣協會會報》，第29期（1901年2月），頁43。又見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現在圖書〉，《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7日，版2。當日的報紙刊登下午1點開館的消息，並介紹該館目前的館藏特色。

臺灣文庫一開始藏書有漢文圖書3,139冊、日文圖書2,009冊、外文圖書224冊，合計5,372冊，當時的分類法採分8門，第1門宗教類306冊、第2門哲學類304冊、第3門文學、語學類1,216冊、第4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類1,342冊、第5門法律、經濟、財政、社會類457冊、第6門數學、理學、醫學類303冊、第7門工學、藝術、產業、兵事類242冊、第8門叢書、隨筆、雜誌、雜書類1,399冊、另有掛圖48幅。¹⁰¹隔年2月館藏就已擴展至一萬多冊。¹⁰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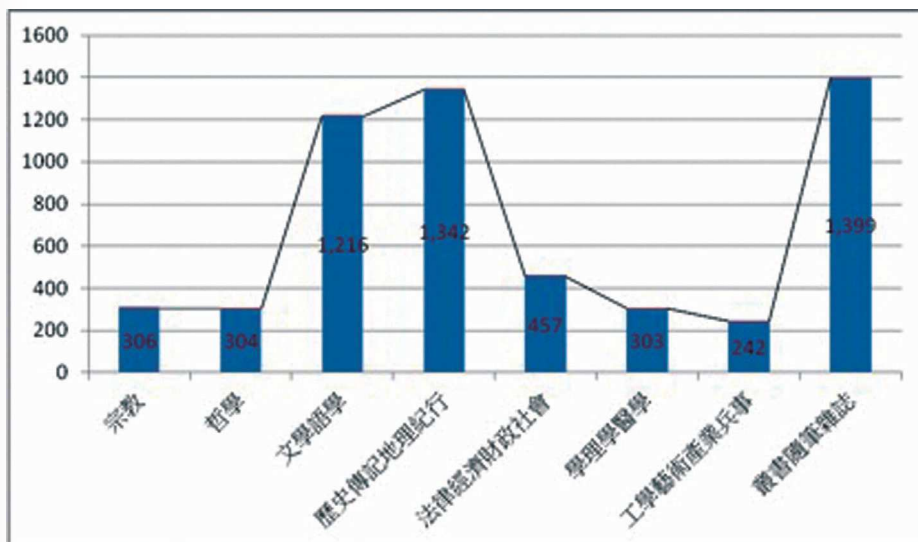


圖4 臺灣文庫開館圖書分類冊數分布圖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現在圖書〉，《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7日，版2整理繪圖。

101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現在圖書〉，《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7日，版2。當時的分類法採分8門，第1門宗教類306冊、第2門哲學類304冊、第3門文學語學類1,216冊、第4門歷史傳記地理紀行類1,342冊、第5門法律經濟財政社會類457冊、第6門數學理學醫學類303冊、第7門工學藝術產業兵事類242冊、第8門叢書隨筆雜誌雜書類1,399冊、另有掛圖48幅，加總起來為5,617冊。兩種計算方式的總和，與當時公布的總冊數5,863冊，皆不相同，可能是排印時的校正有誤。報導中另特別說明尚有數百部法文圖書因船運延遲，尚未到館無法分類，故不列入計算。

102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彙報〉，《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11日，版3。該則新聞報導臺灣文庫在各方踴躍捐輸下，館藏已突破1萬冊，不但在臺灣向民眾持續募書，也對外國駐臺灣的領事館募集該國圖書；亦在日本各地募書，還特別介紹在東京向木下新三郎募到數百部的圖書；此外也採用募款的方式，如舉辦音樂會收取義捐，以增加購書的經費。

伍、臺灣文庫的營運模式

今日圖書館的經營要素有組織與館員、館舍、館藏、服務項目與經費，非常令人遺憾的是，當時臺灣文庫的日常營運並無詳細的檔案資料被保留，目前能夠尋查得到的資料，最完整的是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所編印的《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¹⁰³從《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一年報》開始，就有記載臺灣文庫的營運情形，但也僅止於介紹梗概與彙編數據資料，無法透過該年報瞭解更多營運細節。此外，《臺灣日日新報》就當時的臺灣文庫，若有特別的事件均會加以報導，緣此，本節將採用《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與《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所載內容，試圖拼湊瞭解該文庫的營運。

關於組織與館員的分析，圖書館要正常運作，有賴分工進行各項不同的業務，但從上述的資料中，無法判別該文庫是否有明確的工作分組，僅得知開館當日，枋內正六、岡田、加藤等3人被指定為「幹事」，¹⁰⁴此外並無其他關於組別或工作職掌的記錄，但這3人皆有正式職務在身，能否每日到館值班，值得懷疑。至於是否有其他職員，筆者由每日開館的時數推測，理應要有固定值班人員，進行例行的收費與閱覽服務，至於每年固定的曬書工程亦應有職員進行，關於這些人員的建置與職掌則未見文獻提及，亟待日後更多史料出土，作進一步分析。

眾所皆知文庫所在地的「淡水館」，是清領時期的登瀛書院，傳統書院的格局與規畫，與現代化經營的圖書館空間模組無法相容，我們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中可以觀察到，登瀛書院的外觀呈現傳統建築結構，內部係採兩層樓三合院的格局，因此如何利用原建築格局來適應圖書典藏與提供閱覽空間，值得深究。此外，由於日治初期臺北缺少大型公共空間，樺山資紀總督將登瀛書院充當臺灣總督府官員俱樂部，後又充當公會堂，兒玉源太郎總督亦在

103 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1號至第8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2年至1912年）。

104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庫式〉，《臺灣協會會報》，第29期（1901年2月），頁43。

此處舉行「揚文會」，該處所經常舉辦各種大小活動，大門口甚至有守衛站崗，淡水館呈現多功能的空間用途，臺灣民眾對於該場域的既定印象非常深刻，應當不敢隨意進入利用文庫資源。

該文庫最早以會員形式組成，亦對外開放給一般民眾進入閱覽，¹⁰⁵為了維持圖書館的正常運作，援引日本圖書館舊例，¹⁰⁶訂出了普通及特別閱覽的收費標準，收費金額分別為普通閱覽3錢、特別閱覽5錢，可惜並未說明兩者的差別待遇；士兵與巡察（警察）半價優惠。為吸引長期讀者，甚至推出優惠折扣價格，例如普通閱覽每次為3錢，10次則為25錢、30次優惠價50錢；特別閱覽費每次5錢，10次則為40錢、30次優惠價80錢。¹⁰⁷但是臺灣當時的生活水準普遍低落，¹⁰⁸因此利用率不高。

此外，因該文庫屬私立性質，除固定收取進館閱覽費以外，經營費用全靠募款而來，甚至舉辦音樂會來募款，¹⁰⁹以及不定期的捐款，例如當年的發起人之一的藤田嗣章，因調任回日本，捐款給臺灣文庫，被《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詳加報導。¹¹⁰或是一般的市民主動捐款，例如有1位行政官員的母親變賣名貴髮飾與衣服所得，捐款66圓40錢給臺灣文庫，該女士的義行，透

105 伊能嘉矩，〈臺灣圖書館小史〉，頁25。

106 李春生於1896年隨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訪日，在日本停留64日，期間對於日本的教育機構和基督教會的興盛，印象特別深刻，對於上野博物館的陳設與學校的硬體規模皆大為讚嘆，見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收入李明輝等編，《李春生著作集》，4（臺北：南天書局，2004年），頁183、209-210。又鄭神寶在1914年到日本旅行，羅萬俤自1915至1920年留學日本，雖然抵達日本的年代不同，但皆留下對日本圖書館的觀察或使用紀錄，進入圖書館不但需要付費且要脫下鞋子。見又見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7月20日，版4。參見半仙，〈東京の文明〉，《臺灣》，第3年第1號（1922年4月），頁62。

107 〈臺灣文庫開庫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1月25日，版2。

108 參考「臺灣文庫」成立17年後的物價水準，大正7年（1918）鹽1斤2錢、白砂糖1斤27錢、醬油1升為38錢、雞肉1斤46錢、臺灣產白米1石價格為26元87錢。參見財團法人臺北仁濟團，〈物價比較表〉，《財團法人臺北仁濟團第26回年度報告書》（臺北：財團法人臺北仁濟團，1929年2月），頁11-12。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年），頁263。

109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音樂會の收金高〉，《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16日，版2。說明文庫成立週年紀念音樂會，義捐所得達159圓37錢，並已存入帳戶專款專用。

110 不著撰人，〈留別紀念金寄贈〉，《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3日，版2。該新聞報導藤田嗣章軍醫正調回日本，特別捐出50圓給臺灣文庫。

過《臺灣日日新報》的宣傳，期盼能達到更多人共襄盛舉。¹¹¹然而，總結而言，捐書的比例遠超過捐款，¹¹²日常的營運開支是為「臺灣文庫」最大的隱憂。從統計數字觀察，收入的金額遠不及每年的實際支出，例如開館的第一年，是歷年進館人數最多，達1,680人次，累計收入的費用也才41圓，但該年的總支出卻高達1,098圓，如此懸殊的收支不平衡的情況，是導致臺灣文庫無法永續經營的諸多原因之一，也是最嚴重的癥結所在。

至於服務項目，可分為開館時間與閱覽人次兩方面進行說明。

關於開館服務的時段，初期開放閱覽從早上9時到下午3時（中午不休息），但隨著電力的普及與擴大服務，而延長開放時段，增加晚上6時到10時。¹¹³休館日為每年1月1日到4日、紀元節、天長節、12月28日到31日；以及每月1日為清潔打掃日；和7月、8月為曝書月，有10天不開放，因臨時不開館等原因，平均每年開館日數約為330日。

該文庫初設之時，設備簡陋、閱讀席位不多，缺乏良善運作系統，整體功能並不完備。開館之初明治34年（1901）全年，臺灣文庫的閱覽人數尚有1,680人次，平均1天僅5人次；以後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1902年全年降到762人次，1903年稍微回升至939人次，1904年驟降1,693人次，1905年更僅剩489人次，1906年才166人次進館，平均每天不到1人進館。¹¹⁴臺灣文庫開館6年的進館比較，請見圖5。

持平而論，圖書館的興盛與否，與當時的人民教育程度、整體經濟發展、社會環境的成長息息相關，日治初期的臺灣教育發展，根據統計調查，公學校的擴充速度緩慢，學童入學率亦低，直到1915年，才僅有9.6%，其

111 不著撰人，〈奇特なる婦人〉，《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8日，版5。該新聞報導土地調查局的官員母親堂野間捐款66圓40錢給臺灣文庫，該女士的捐款係變賣名貴髮飾與衣服所得，《臺灣日日新報》認為此乃善良美舉值得效法。

112 檢索《臺灣日日新報》，可以發現捐書的報導多達27則，捐款的報導，則除開館初期的募捐活動外，只有4則報導。

113 雜報，〈臺灣文庫の夜間閱覽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3日，版5。

114 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至第8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

中又有中途退學者。¹¹⁵加上臺灣為典型農業社會，民眾對於新式的文化機構——圖書館——的利用，根本從無使用的經驗與需要，因此，臺灣文庫服務的對象應以在臺日人為主，缺乏廣大的讀者群，應是無法持續經營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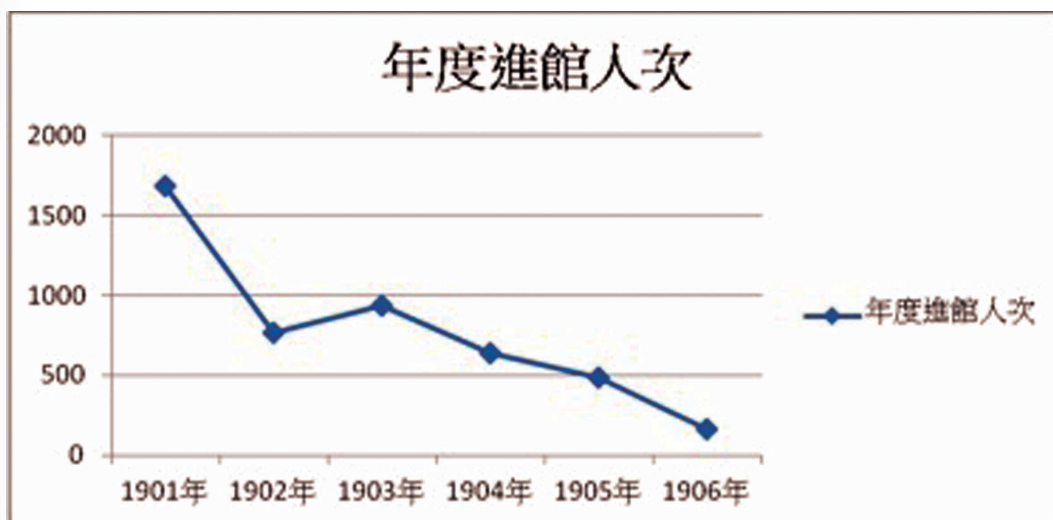


圖5 臺灣文庫進館人次年度比較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號至第8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整理繪圖。

與進館讀者人次呈現相反的情形，臺灣文庫的圖書每年均穩定持續增加，甚至增加的幅度亦令人訝異，在得書不易的先天環境下，竟能夠年年都有藏書的成長，可以得知臺灣文庫經營者的努力與用心，圖書增加的原因，一為政府機構與私人的捐贈，無論是日本中央政府各單位與臺灣總督府的出版品，皆會寄贈；此外，不但在臺灣向民眾持續募書，也對外國駐臺灣的領事館募集該國圖書；亦在日本各地募書，《臺灣日日新報》還特別介紹在東

11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頁76、122。

京向木下新三郎募到數百部的圖書。¹¹⁶二為文庫持續採購圖書，從《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得知，甚至將全套的《古今圖書集成》購入典藏，¹¹⁷也不斷採購新書。¹¹⁸從圖6的曲線圖可以清楚瞭解成長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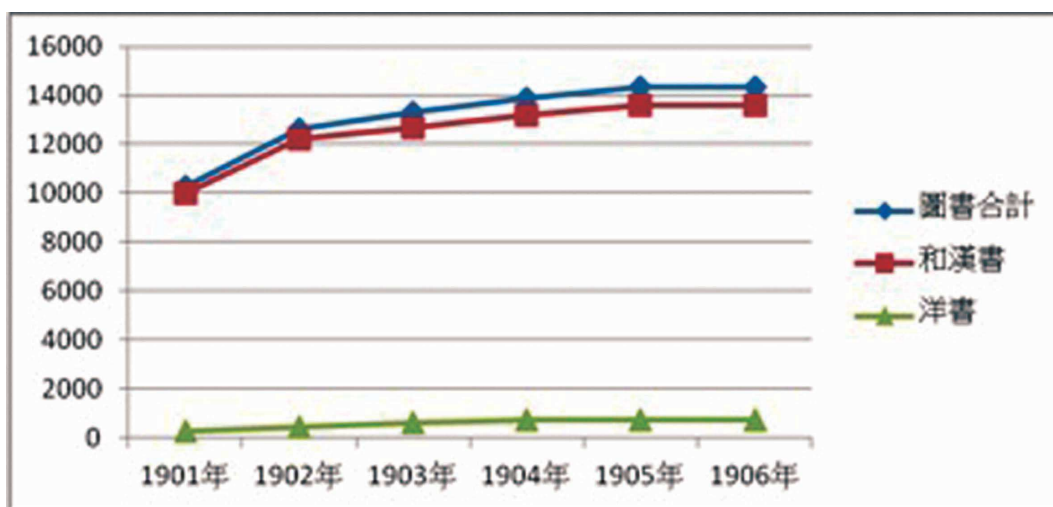


圖6 臺灣文庫歷年圖書增加分析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至8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整理繪圖。

臺灣文庫的營運內容，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僅能從上述的檔案中，整理出關於藏書量的增加、閱覽人數的遞減與經營費用的拮据，我們將《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的歷年數據綜合歸納，整理如表1內容，就可以非常明顯觀察到，臺灣文庫在這種缺乏有力的母機構支持與經費奧援的情形下，能夠維持營運6年已屬艱難。

116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彙報〉，《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11日，版3。

117 不著撰人，〈古今圖書集成の到着〉，《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8日，版2。

118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の購書買入〉，《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2月5日，版2；不著撰人，〈臺灣文庫の買入書〉，《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3月29日，版2；不著撰人，〈臺灣文庫新規購入書目〉，《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29日；版2，不著撰人，〈臺灣文庫新規購入書目（承前）〉，《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1日；版2，不著撰人，〈圖書蒐集報告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2月29日，版5；不著撰人，〈寄贈及購入書目〉，《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9月18日，版6。

表1：「臺灣文庫」歷年藏書、開放日數、閱覽人次與經費統計表

	明治34年 1901	明治35年 1902	明治36年 1903	明治37年 1904	明治38年 1905	明治39年 1906
和漢書（冊）	9,978	12,213	12,680	13,185	13,586	13,599
洋書（冊）	283	430	626	701	737	737
合計（冊）	10,261	12,643	13,306	13,886	14,323	14,336
年度開館天數（日）	320	297	325	343	342	206
年度閱覽總數（人次）	1,680	762	939	639	489	166
每日開館平均閱覽數（人次）	5.25	2.57	2.89	1.86	1.43	無統計
閱覽費收入（圓）	41	23	25	22	17	無統計
年度支出總額（圓）	1,098	651	609	631	545	317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文庫〉，《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2號至8號號（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製表。

經營臺灣文庫的核心幹部鑒於未來能持續經營，咸認為有擴大組織的必要，開館的隔年，明治35年（1902）決議將「臺灣文庫」併入「臺灣協會臺灣支會」的附屬單位。¹¹⁹然而成為「臺灣協會臺灣支會」的下屬單位，並未改變「臺灣文庫」經營的窘境。即使後來在明治40年（1907）「臺灣協會」擴大為「東洋協會」，¹²⁰也無法讓「臺灣文庫」重新再恢復營運。¹²¹加上日後的臺北市「市區改正」計畫¹²²及房屋腐朽，明治39年（1906）8月11日「臺灣文庫」正式閉館，5天後的8月16日淡水館被拆除，圖書移交「東洋協

119 雜報，〈臺灣協會支部の新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26日，版2。

120 1905年日俄戰爭勝利後，隨著日本勢力之擴大，殖民領土範圍增加，擴大臺灣協會的規模，野心範圍亟於東洋，1907年臺灣協會改稱為東洋協會。林呈蓉，《水野遵：一個臺灣未來的擘畫者》，頁128-131。雜報，〈臺灣協會支部の新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26日，版2。

121 不著撰人，〈東洋協會と圖書館〉，《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5月21日，版2。該新聞報導自從位於淡水館的「臺灣文庫」閉館後，該批藏書目前暫放置於天后宮內，該會正尋覓合適的建築物，讓圖書館能夠早日開放供眾使用，但因保存條件太惡劣，藏書受蠹魚與潮溼危害，藏書計為15,280冊。

122 1900年8月23日公告「臺北城內市區計劃圖」，這個計畫對臺北城的街廓、道路、公園綠地、鐵道路線與官方建築預定地，做全面性的規劃，可謂對臺北市區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黃俊銘，《總督府物語：臺灣總督府暨官邸的故事》，頁30-32。由於計畫龐大，依照先後順序執行，「淡水館」也面臨拆除的結局。

會臺灣支部」來保管。¹²³

該批圖書的命運多舛，本來先收藏在府後街的「天后宮」，¹²⁴後來又遷至臺北公園，但該處並不適合存放圖書，因此又轉遷於大稻埕六角街「林本源商號」的倉庫，但一直遍尋不到合適的場地重新開放，¹²⁵因而只能飽受蠹魚和潮濕的危害，¹²⁶「東洋協會臺灣支會」雖有意恢復文庫的設置，一度曾進行復館的計畫，重新發動募捐興建館舍，無奈最後卻無法再次開館。¹²⁷經過塵封6年後，日後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接收。¹²⁸

陸、落幕與等待契機

一個文化事業要能永續發展，除須具備恢弘的企圖心，更需要有萬全的經營計畫，充裕的預算是所有文化事業最基本的基礎，加上專業的經營團隊，與積極的年度目標，確實可行的推廣活動，才能讓事業可長可久。

回顧臺灣歷史上第1個近代化的圖書館——臺灣文庫，自1901年開館至1906年，因各種主、客觀條件而閉館，雖然其生命僅有短暫的6年，但從倡議籌備期一直到最後的結束，期間有無數的關心人士，或宣傳、或募捐、或捐書、或捐款、或支持，各種有形無形的奧援，無不盡心盡力。然因一來係熱心文化臨時團體所成立，無雄厚的經費援助，明顯地就呈現先天的缺憾，雖有小額捐款仍不敵固定的龐大營運支出，從歷年銳減的營運收入，與不斷

123 不著撰人，〈淡水館と臺灣文庫〉，《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7日，版2。該則新聞報導由於淡水館面臨拆除，決定該月11日閉館，臺灣文庫的館藏交由峽謙齊等7人為整理委員，負責後續交接事宜。

124 又稱為「臺北天后宮」，是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光緒14年（1888）所建，原址位於現在臺北二二八紀念公園內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125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17日，版2。

126 不著撰人，〈圖書館と蟲害〉，《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2月20日，版3。

127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の再設〉，《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21日，版2。又見不著撰人，〈圖書館の必要〉，《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7月24日，版1。

128 不著撰人，〈東洋協會支部總會文庫開設方法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5月17日，版2。

增加的支出，即可預見閉館的結局。

再者，臺灣文庫所座落的館址為清季建築的「登瀛書院」，傳統中國式的書院建築與現代化的圖書館格局本就不相容，再加上此處非單一圖書館的用途，乃臺灣總督府的官員俱樂部，是1個多功能的場所，一般臺灣普通人民如何輕易登堂入室，再加上當時臺灣民眾的生活經濟條件與教育程度，對於利用圖書館的需求度極低，因此讀者人數不多且大部份是日本人士，就不足為奇；第三雖有文庫的核心幹部與委員，但都非經營圖書館專業人員，雖有心經營，因各種客觀條件未具備，即使擁有崇高的文化理想，無從有更落實的推廣之道；最後在臺灣總督府重新擘劃臺北城的現代化市容改正的潮流中，隨著「淡水館」的拆除，「私立臺灣文庫」從此走入歷史。

該批為數多達14,336冊的圖書，¹²⁹經過「東洋協會臺灣支會」的熱心會員們，不斷促請建議臺灣總督府盡速設立官方圖書館，¹³⁰並提出建議書，並聲明該建議若被臺灣總督府採納，經協會保管的所有原「臺灣文庫」圖書，以及文庫基金與捐贈金2,221圓，和書架、閱覽檯、桌椅等家具，還有1份「應購藏圖書書目」全部無償捐出，¹³¹終於在大正3年（1914）列入政府預算，並於該年4月14日公布臺灣總督府設立圖書館的設置辦法《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¹³²接收所有原來「臺灣文庫」藏書，延續圖書的生命，讓「臺灣文庫」的精神，透過圖書典藏的轉移而繼續傳承。

總括而言，臺灣文庫是上層社會知識份子，在當時看到臺灣的社會情形與文風，欲將日本國內漸已普及的圖書館引進，帶有啟發民智、移風易俗的色彩，其創設意旨也多強調臺灣的文風不盛、人文未開、不守規律，因此需要圖書館予以轉化民風。然而臺灣文庫的目的立意良善，提倡鼓勵閱讀以提升文化水準，卻無法繼續經營，可以嘗試借用當代美國人類學家柯利佛格

129 伊能嘉矩，〈臺灣圖書館小史〉，頁24。

130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設實行委員會〉，《臺灣時報》，第33期（1912年5月30日），頁2。

131 山中樵，〈臺灣から（二）總督府圖書館の創業〉，《圖書館雜誌》，第22卷第12期（1928年12月），頁290。

132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收入《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1914年4月23日，473期，頁106。

（Clifford Geertz）的理論解釋，柯利氏認為文化是多層性的，當兩種不同文化相接觸時，各層的反應是不一樣的，與文化價值有關的部分是最不容易被撼動，與生活利益有關部分，比較容易改變。¹³³用來解釋漢人傳統的文化世界未曾出現提供給公眾使用的圖書館，圖書館借由日本籍的知識份子引進臺灣，但是臺灣人民並不熟悉這個由西方文明所產生的新機構，因此導致最後廢館的結局。

133 柯利佛格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南京：譚林出版社，1999年），頁2。

參考書目

一、基本史料

臺灣總督府，《臺北市街全圖》。臺北：臺灣總督府，1900年。

臺灣總督府，《揚文會》。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3。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年。

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課，1906年至1912年。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社會教育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1933年。

二、專書與論文集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

日本図書館協会編，《図書館雑誌総索引》。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64年。

日本図書館協会編，《日本図書館協會創立百年記念》。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92年。

日本図書館学会研究委員会編，《図書館学の教育》，上，論集・図書館学研究の歩み第3集。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83年。

水谷長治，《図書館文化史》。東京：勉誠出版社，2003年。

矢内原忠雄，《矢内原忠雄全集》，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年。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東京：社會評論社，2005年。

田中王堂，《福澤諭吉》。東京：みすず書房，1987年。

- 田中彰，何源湖譯，《明治維新》。臺北：玉山社，2012年。
- 北岡伸一，魏建雄譯，《後藤新平傳》。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05年。
- 寺田光孝、加藤三郎，《圖書及び図書館史》。東京：樹村房，1999年。
- 李永熾，《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臺北：水牛出版社，1991年。
- 李明輝等編，《李春生著作集》，4。臺北：南天書局，2004年。
- 佐藤忠恕，《図書館の文化史的研究-明治末期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77年。
- 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年。
- 呂理州，《改造日本の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臺北：遠流出版社，1993年。
- 呂理州，《明治維新》。臺北：遠流出版社，1994年。
- 阿部洋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第3部臺灣の部。東京：龍溪書舍，2004年。
- 松本，〈トショカン〉，《大百科事典》，第19冊。東京：平凡社，1933年。
- 吳三連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
- 林呈蓉，《水野遵：一個台灣未來的擘畫者》。臺北：臺灣書房，2011年。
-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
-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2000年。
- 林景淵，《日據時期的臺灣圖書館事業》。臺北：南天，2008年。
- 林柏維，《臺灣臺灣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年。
- 長澤雅男、戸田愼一編，《図書館学研究入門：領域と展開》。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93年。
- 袁明主編，《美國文化與社會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張炎憲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3冊。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年。

- 張圍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臺灣古籍出版，2005年。
- 張勝彥等編，《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
- 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 黃秀政，《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
-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2013年。
- 黃俊銘，《總督府物語：臺灣總督府暨官邸的故事》。臺北：向日葵文化，2004年。
- 黃煌雄，《臺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76年。
- 椎名六郎，《新図書館学概論》。東京：學藝社，1986年。
- 黑田甲子郎，《田健治郎傳》。東京：田健治郎傳記編纂會，1932年。
- 鈴木博雄，《原典・解説日本教育史》。東京：日本図書文化協会，1985年。
-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臺北：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
-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卷1。東京：時事新報社，1898年。
- 福澤諭吉，楊永良譯，《福澤諭吉自傳》。臺北：麥田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 綿拔豐昭，《図書館文化史》。東京：學文社，2006年。
- 蔣朝根，《蔣渭水留真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年。
-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青史社，1939年。
-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臺灣社會教育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文教局社會課，1933年。
-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1916年。
-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1924年。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編，《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概覽》。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1943年。

潘淑慧，《日本公共圖書館的經營與管理》。臺北：望春風出版社，2008年。

簡耀東，《中日韓三國圖書館法規選編》。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公司，1994年。

Catherine Drinker Bowen，鄭明萱譯，《費城奇蹟：美國憲法誕生的關鍵127天》。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年。

Elmer Johnson，尹定國譯，《西洋圖書館史》。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

E. Patricia Tsurumi，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年。

Jesse H. Shera，鄭肇陞譯，《圖書館學概論：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新竹：楓城出版社，1986年。

S. R. Ranganathan,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Bouth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57.

三、期刊與學報論文

又吉盛清，〈沖繩教育と臺灣教育〉，《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1999年第2期（1999年11月），頁52-70。

山中樵，〈臺灣から（一）臺灣文庫と石坂文庫〉，《圖書館雜誌》，第22卷第10期（1928年10月），頁242-243。

山中樵，〈臺灣から（二）總督府圖書館の創業〉，《圖書館雜誌》，第22卷第12期（1928年12月），頁290-292。

山中樵，〈打開を要する圖書館の現状〉，《臺灣時報》，第206期（1937年1月15日），頁30。

于錢寧娜，〈美國公共圖書館多元化的募款途徑〉，《臺北市立圖館館訊》，第18卷第3期（2001年3月），頁8-18。

王麗蕉、黃燕秋、李依陵，〈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概況及其數位典藏發展〉，《國家圖書館館刊》，101年第1期（2012年6月），頁4-6。

木母浮浪，〈臺灣圖書の蒐集〉，《臺灣時報》，第64期（1915年1月20日），頁34。

不著撰人，〈臺北圖書館發起會〉，《臺灣協會會報》，第2期（1898年11月），頁85。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期（1898年11月），頁101-102。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6期（1900年1月），頁78-81。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7期，1900年2月），頁80-81。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年3月），頁67。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年3月），頁78-80。

不著撰人，〈臺北の揚會〉，《臺灣協會會報》，第18期（1900年3月），頁67-68。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19期（1900年4月），頁70-72。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0期（1900年5月），頁62-64。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2期（1900年7月），頁51-53。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3期（1900年8月），頁

60-63。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5期（1900年10月），頁60-62。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6期（1900年11月），頁65-67。

不著撰人，〈寄贈書目〉，《臺灣協會會報》，第27期（1900年12月），頁41-43。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庫式〉，《臺灣協會會報》，第29期（1901年2月），頁43。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設實行委員會〉，《臺灣時報》，第33期（1912年5月30日），版2。

不著撰人，〈私立石坂文庫の近況とその將來の計畫〉，《図書館雑誌》，第22期（1914年11月），頁58。

支部報，〈臺灣文庫圖書の引繼準備〉，《臺灣時報》，第63期（1914年12月15日），頁56。

半仙，〈東京の文明〉，《臺灣》，第3卷第1期（1922年4月），頁62-65。

宇治鄉毅，〈石坂莊作と「石坂文庫」—日本統治臺灣における先驅的図書館の軌跡を中心に—〉，《同志社大學圖書館學年報・別冊》，第30期（2004年6月），頁16-40。

宇治鄉毅著，何輝國譯，〈石坂莊作與石坂文庫——以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先驅圖書館之軌跡為中心〉，《臺灣學研究通訊》，第2期（2006年12年12月），頁82-101。

伊能嘉矩，〈臺灣圖書館小史〉，《私立石坂文庫第5年報》，1914年12月，頁23-28。

英惠奇，〈美國公共圖書館的演進與展望〉，《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第25卷第1期（2007年9月），頁24-30。

馬少娟，〈臺灣區公共圖書館史略（1895-1976）〉，《教育資料科學月

刊》，第11卷第3期（1977年5月），頁26-31。

馬宗榮，〈日本圖書館事業的史的研究〉，《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季刊》，第4卷第2期（1932年6月），頁177-191。

張圍東，〈日據時期私立臺灣文庫發展史〉，《書苑》，第23期（1995年1月），頁49-56。

陳光華、林欣怡，〈日本圖書資訊學教育的發展與現況〉，《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刊》，第16期（2001年11月），頁117-144。

莊麗蘭，〈臺灣公共圖書館發展史——1901-1949年〉，《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28卷第1期（1990年9月），頁87-130。

財團法人臺北仁濟團，〈物價比較表〉，《財團法人臺北仁濟團第26回年度報告書》，1929年2月，頁11-12。

桂太郎，〈臺灣協會の設定に就て〉，《臺灣協會會報》，第1期（1898年10月20日），頁1。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2005年3月），頁209-251。

盧秀菊，〈西洋圖書館發展探析〉，《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75期（2005年12月），頁1-11。

四、學位論文

曾堃賢，〈日據時期（1895-1945）臺灣區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張圍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郭冠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藏政策之研究〉，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

嶋田晋，〈カリキュラムに見る日本の戦前と戦後の図書館学教育の連続性〉，東京：慶応義塾大学文学部図書館情報学科卒業論文，2000年。

五、報刊文章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發起人會〉，《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7月7日，版2。

不著撰人，〈御慶事彙報其一紀念圖書館設置〉，《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21日，版1。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に望む〉，《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7日，版1。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現在圖書〉，《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7日，版2。

不著撰人，〈留別紀念金寄贈〉，《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3日，版2。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彙報〉，《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11日，版3。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音樂會の收金高〉，《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16日，版2。

不著撰人，〈奇特なる婦人〉，《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5月8日，版5。

不著撰人，〈淡水館ご臺灣文庫〉，《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7日，版2。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の再設〉，《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7月21日，版2。

不著撰人，〈圖書館の必要〉，《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7月24日，版1。

不著撰人，〈東洋協會と圖書館〉，《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5月21日，版2。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17日，版2。

不著撰人，〈東洋協會支部總會文庫開設方法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5月17日，版2。

不著撰人，〈圖書館と蟲害〉，《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2月20日，版3。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開庫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25日，版2。

不著撰人，〈臺灣協會支部の新事業〉，《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26日，版2。

不著撰人，〈臺灣文庫の夜間閱覽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3日，版5。

鄭神寶，〈東游隨筆〉，《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7月20日，版4。

六、網路資料

〈日本図書館協会の歴史〉，收入「日本図書館協会」網站：www.jla.or.jp/jla/tabid/226/Default.aspx，2014年2月11日點閱。

〈目黒区立守屋図書館訪問記〉（2013年4月28日），收入「東京図書館制覇」網站：tokyo-toshokan.net/00000472.htm，2014年3月25日點閱。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簡介〉，收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指南」網站：tbmc-2.nlpi.edu.tw.eproxy.nlpi.edu.tw:2048/about.html，2014年2月20日點閱。

〈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收入「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網站：en.wikipedia.org/wiki/Library_Company_of_Philadelphia，2014年2月12日點閱。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Focusing on “Taiwan Daily News”

Ching-hu Lin^{*}

Abstract

The first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in Taiwan was established in 1901 cost three years to prepare. This library was located in “Tamsui Building” which was the club for officials of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Palace at that time frame, and it was easily to be misunderstood with color of the government. In fact, this library was opened for the public to read and hold exhibitions. It was run by member structure and charged from people to use.

“Taiwan Daily News” which had lasted 47 years completely recorded the true Taiwan at that time frame, all aspects from rules, daily news, social phenomenon, to life styles, all truly reported. The newspaper had a very completely report of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tarted in 1898, the whole procedure of preparation, book raising, fundraising, operation, to the final closed, books transferred, and the after tracing report all in details. And this was the most completed record of the librar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report of “Taiwan Daily News” ruled by Japanese Governors to analyze the whole social atmosphere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library.

The study says that there are four reasons from subjective view and objective view why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could not be continued running: the first, there was no 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and apparently it is the born regret; the second, the location of the library was “Deng-Ying Academy” from the Ching Dynast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building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 design. Besides, the location was the club for the officials of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Palace, people were less in study and most of them were Japanese; the third, the stuff of the library even they had higher ideals of culture, but weren't professional, so they were thinking more and better than practicing and promoting; the final,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was in history with the demolishing the "Tamsui Building" and the remodel of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Palace to model city.

Keywords: Private Taiwanese Library, Taiwan Daily News, social education, librarianship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